

1903年前后 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原因探析

邓 杰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间接接触了西方近代社会及政治制度,思想日趋激进。但是,在1903年出访美国之后,梁启超却公开宣称自己“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其思想政治立场从主张排满革命、实施民主共和退回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圈子之中。促使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他在美国考察所产生的对民主政治的失望,与其服膺的政治理论的改变,以及与其对国民性改造艰巨性认识所产生的畏难心理有关,也与他当时窘迫的个人处境及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关系变化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 梁启超;美洲之行;政治思想;转变;原因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3)02-0134-06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他避开了在故国专制政体下的种种限制,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加之有条件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更多也更为直接地吸收新的思想养料。这一切,使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1](18页),政治上由温和变得相对激进。正如他自己所说:“自东居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2](186页)1903年初春,梁启超由日本出访北美。按照通常的逻辑理解,受立宪国日本的政治影响就已变得激进的梁启超前往往实施共和民主制度的美国考察之后应该更加激进。但是,在年底东还时,他却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友共和者,其将唾余。”表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3](86页)。宗旨顿

改,言论骤变,开始了他思想政治立场上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从主张排满革命、实施民主共和的激进立场,又返回到改良派的圈子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这一重要转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析。

一 对美国社会政治状况的观感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首先与他对美国社会政治的观感有关。1903年初春,梁启超对美洲进行了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梁启超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作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梁启超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有一些好的方面,但总的说来,是“弊大于利”,尤其是美国的各大政党操纵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由此形成了“政党分赃制”。梁氏认为,这一制度是政治生活的一大退化,尽管19世纪末建立起公务员制度,其缺陷仍不能得到有效纠正[4](170页)。而“政党分赃制”最明显的特点莫过于选举制。梁启超对美国地方经常性的选举,特别是市级的选举极

收稿日期:2002-11-01

作者简介:邓杰(1973—),女,四川省达州市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指导教师杨天宏教授。

为不满,将之说成是财力的巨大浪费和重大的舞弊。他认为美国的选举制有如下弊端。(一)总统竞选之弊。梁启超详尽描述了参加选举政党的种种表现,他们各以“党派之私见为之”,看重“一党目前之利害”,而不顾“国家百年之大计”,党派之间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各州选举人以州为本位,加之采用间接选举法,大州与小州之间得票之数相差悬殊,造成“冲要之邑,虽庸材反得以成名”[5](63页)的不合理现象。此外,“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梁氏因此“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①[5](65页)。(二)官职屡屡更迭之弊。梁启超说,美国“任用官吏法,殆如一市场”[5](142页)。由此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官场成了拍卖场,每次总统选举后到白宫索官者络绎不绝,养成了一批在生计上学业上皆不能自立,而惟以政治为生涯,以“尽瘁于党事”为衣食之来源的“政界之虱”。二是任期短,官员难以尽心国事。“官如传舍,坐席不暖,人人有五旦京兆之心,事之所以多凝滞也”,这是共和政治的“最大缺点”[5](141页)。(三)市政腐败。如纽约市,平均每年选举费和各党派运动费达六七十万美元。这些费用表面上由候选人和入选得官之人担负,实际上他们不会自己掏腰包,而是取偿于市政公费。由此,“美国诸大市中,如纽约、费尔特费等,常为黑暗政治之渊藪”[5](143页)。(四)选举频繁。美国的选举较之欧洲各国,数目要多得多。选举频繁,一方面使缺乏政治经验的市民无从直接选举出合适的人选,而往往是听从各政党的摆布;另一方面是选举费、运动费浩繁,非普通党派所能承担,从而导致了大党“独霸政界”[5](145页)的结果。在亲自考察公民选举过程中,梁启超常常发出疑问:一个旨在寻求公众喝彩而不是谋求解决真正问题的民主制度是否一定比专制制度优越?在梁启超离开美国时,他带着这样的印象,“即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离他曾经设想的相去甚远”[4](170页)。

在梁启超看来,即使美国的民主制度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尽善尽美,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前既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深深地植根于殖民时代各地方的自由制度中。他说,美国的共和制度好比是由许多小屋构成的大厦,这些小屋在大厦建成以前早已存在,大厦之所以宏大

经久,原因必须在这些小屋的构成中寻找[4](170页)。梁氏认为,这是美国政治的特色,亦是共和政体所以能实行能持久的原因。如果要仿效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必须了解其政治制度演变的历史和建立的基础,必须具备与之相同或相似的条件。而以中国政治的历史及现状看,中国则明显缺乏这方面的基础,若贸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无异于自杀其国也”[5](124页)。

在赴美之前,通过阅读日文翻译书籍,梁启超曾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十分完美。但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生活的实际考察,却使梁启超对其所表现出来的弊端表示深深的遗憾。在他看来,具有民主传统、人民民主意识较强的美国尚且如此,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若贸然实行民主,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可能法兰西、南美诸国混乱的政治现状就是教训。对美国政治生活状况的这些认识,使梁启超对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其政治思想和主张发生变化,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 政治信仰与政体主张的变化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先后到过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广泛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其选择、介绍、阐发的国家理论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梁启超首先接触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说。1901年底,梁启超写出《卢梭学案》一文,对卢梭学说作了阐释。梁启超认为,卢梭学说中最精要的内容是基于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主权在民学说。中国深受专制之苦,只有按照卢梭学说,更改制度,前途才大有希望。他写道:“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为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今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为最易焉。”[6](110页)显然,梁启超已将《社会契约论》视为医治中国政治弊病的一剂良方。他到日本后思想日趋激进,与服膺卢梭学说有直接关系。

但是,梁启超不久就对卢梭学说产生了怀疑。在加拿大、美国游历期间,他参观考察了美国上议院、下议院和华人社团,对西方民主政治优劣利弊有了直接的感受,这动摇了他原来将“民主”作为解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有效手段的信念。自美国返日之

后,梁启超写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详细介绍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权学说,并以此为理论依据,从三个方面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说进行诘难。一是卢梭关于国民可以自由加入或离开他的国家的理论。梁启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维持一个个社会团体的存在,而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二是卢梭关于人民公意即制定国家法律主旨的观点。梁启超认为这也站不住脚,因为任何法律条文都不可能赢得所有方面的赞同,或者说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都能在法律上得到体现。三是卢梭关于国家政治生活中人人平等、自由的理论。梁启超认为也是不可能甚至是荒谬的,因为在国家建立过程中及国家成立后,领导集团拥有权威是绝对必需的。他指出,卢梭理论这些缺陷的根源在于他没有看到社会与国民的根本区别。“社会”与“国民”是不同的概念,社会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无数个人的“结集体”,而国民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整体,与国家不可分离,有国民才有国家,然后才有国家主权意识。对于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将传统的“部民”转变为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国民”,组成新的国家,至于平等、自由,则是次要的。

在对卢梭学说提出质疑的同时,梁启超对伯伦知理关于共和政体的论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根据伯伦知理的观点及他在美国的观察指出,西方各国的共和制具有使许多人免除国家滥用权力之苦、使国民养成知权利尽义务自觉心的优点。但这种制度必须在特定的土壤中生长,如果缺少适当的条件,共和制度将难以建立并维持下去。法国以革命求自由,“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南美诸国亦皆以革命求自由,“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5](134页)。此外,梁启超认为,共和制度还存在着不能对文化生活进行实质性改进、歧视下层人民的倾向,这在19世纪以后的美国显得十分明显。更为严重的是,共和革命的结果往往最终会导致“平民专制”。在梁启超看来,在这种“平民专制”之下,人们既没有自由,社会也不稳定。这一切,促使他对“革命”“共和”重新进行反思,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写道:

吾醉心共和政体也有年……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所据,皇

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3](85页)

显然,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放弃了卢梭的理论,转而服膺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的有限君主立宪制学说,认为它能调和各种主义、集中政治上的各种优势。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形成了自己新的国家观,用这一国家观重新认识中国现实政治,于是有了1903年之后决然抛弃“革命”与“共和”主张,提倡“开明专制”的政治转变^②。

三 对国民性改造艰巨性的认识

梁启超政治立场的改变还与他认为中国人实施民主共和资格不足、国民性的改造非指日可待有关。梁启超认为,国民与国家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7](1页),国民素质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性质与状态。“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7](7页),“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8](14页),“新民为当务之急”[7](2页),“舍此一事,别无善图”[7](5页)。

梁启超认为,“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事乃无功”[7](5页)。他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和受欺凌,从根本上来讲是国民素质低下造成的,而不应该“科罪于当局”,因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7](5页)。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代新民。然而,当时的中国人还远远算不上可以享受民主生活的“新民”。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以“束身寡过主义”为德育中心点,不讲公德,“只顾一身一家的荣华富贵,不顾国家的兴亡盛衰;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只知忠于君,不知忠于国,甘为一姓之家奴走狗;主柔好静,不尚竞争;依赖成性,缺乏毅力;自暴自弃,自贬

自损；搪塞责任，缺乏独立人格”[7]（13—14页）。不仅如此，中国人还素无国家观念，“耗矣哀哉，吾中国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比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俦；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7]（18页）。这样的臣民对于国家，唯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9]（17页），不可能产生任何的责任感与义务感。梁启超感慨道：“责政府民人，痛痒不关，爱国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国人之所短也。”[10]“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果恒甘，树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国民而为良国民也，则任其中签掣一人为官吏，其数必赢于良，我国民而为劣国民也，则任于其中慎择一人为官吏，其数必倚于劣。”[9]（18页）

访美期间，通过对旧金山等地华人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的考察，梁启超更加确信中国人实行民主制度的资格不够。在《新大陆游记》中，梁氏指出，中国人具有四大缺陷。一曰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梁启超认为，近代国家的成员应当具有国民资格，即便实施地方自治，也应当有市民资格，而华侨则“舍家族制度外无它物”。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梁启超认为，所谓村落思想也就是家乡观念。各省各市之人自爱其省其市乃至其乡之心，可以构成爱国的心理基础。人们不能没有家乡观念，但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已经“发达过度”，“又为建国之一大阻力”[5]（122页）。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梁启超在考察中发现，美国的华人社会治理得极为糟糕。华人会馆虽仿照西人之例制定了各种文明条规，但所作所为则“无一不与条规相反”。像中华会馆这样俨然旧金山全市华人“总政府”的机构，也是百事废弛，无人过问。偶有聚会议事，亦不过是少数上流人士“布告”，“众人唯唯诺诺而已”[5]（123页），毫无民主可言。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梁启超认为，旅美华人概无高尚目标，琐碎自私，缺乏自治能力，对公共事业极为冷漠。人们所心营者“只在一身”，所目注者“只在现在”，没有精神理想，缺乏远大抱负，“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5]（124页）。

梁启超游美，本有实地考察美国政治，尤其是考察当地华人实行自治情形以确定自己政治宗旨的初衷，结果却大失所望，看到了民主共和的诸多问题。在对旧金山华人社区进行考察后，他叹息道：“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

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需要陶冶锻炼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5]（124页）。

显然，20世纪初的国人与梁启超的“新民”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以当时之民德、民智、民力状况论，即便有圣君贤相主政，也难为其功。梁启超由此得出中国不宜于共和政体，如果勉强建立，也会招致种种弊端的结论。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故若强行共和制，“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3]（85页）。于是，梁启超将民主政治作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的信念完全动摇，其“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是十分自然的。

四 师友关系产生的致变作用

梁启超政治立场的转变，还与他的个人处境有关。戊戌变法时期，他追随康有为左右，师生关系融洽，朋友关系密切。流亡日本之后，思想日趋激进，鼓吹革命排满，虽得罪了一些旧日的朋友，但因结识了孙中山、陈少白等一大批革命派人士，彼此往来密切，加之时务学堂一批弟子渡海从师，惟命是从，因而在个人处境上还没有孤独失落感。1900年，从檀香山回来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他与康有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表面上，因为康有为将自力军起义的失败归罪于梁启超筹款不力，导致师徒不和。实际上，由于出国后接触到大量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的梁启超思想发生变化，已很难与康有为就政治问题达成共识。“启超既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11]（63页）。但梁启超仍拂逆师意，“屡与师不合”，对其师的言论“屡起而驳之”，惹得康有为大发雷霆。他在给徐勤的一封信中痛骂梁启超：“卓（如）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年不敬如此，市井人尚不至是，而谓学者如是乎！违命专横既久，自忘其不可矣。”[12]（133页）师徒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另一方面，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关系也搞得不欢而散。梁启超在日本曾与孙中山建立了良

好的关系。1899年12月,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为武装勤王筹措经费。因檀香山为兴中会发源地,“孙中山爱重其人,亲自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见他的哥哥孙眉”[13](62—63页)。梁启超在檀香山受到热烈欢迎,建立了保皇会组织,在当地发展会员,扩大了保皇会的营垒,致使兴中会的地盘越来越窄。梁启超这样做,并不一定是出于欺骗[14],但客观上却挖了兴中会的墙脚。这使他很难面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在革命派方面,由于曾有与梁启超合作致使檀香山兴中会组织接近被抽空的前车之鉴,加之两派成员在各地摩擦冲突日益加剧,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联系,纷纷认为梁启超“欺人实甚”,“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奸尤毒,梁酋之计狡(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认为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5](229—230页)。于是,孙、梁关系也开始恶化^③。

尽管两方面都已得罪,但昔日所栖身的改良派营垒却依然存在着容留梁启超的可能。康梁之间毕竟有一段值得回忆的师生情谊。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二人的关系虽变得极不和谐,但师徒名份尚在。康有为虽然一再怒斥甚至动手痛打梁启超,但他却始终不忍心将自己这位高徒逐出师门,并想方设法要把他重新拉回保皇党的圈子之内。梁启超作为一位注重传统道德的人,对此当然不会没有感触。自美洲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终于作出姿态,以缓和与康有为、徐勤等师友的紧张关系。他在致徐勤的一封信中写道:“长者(康有为)处因相隔太远,而弟往书颇疏,故生出种种支离。实则弟自问一年来对不住长者之举动极多,不怪其恼怒,一切严责之语,弟皆乐受。因长者知我为可责之人,乃肯见责也。前日之事实,或有实由弟之悖谬者,亦有出于无心,而既生支离后,愈滋支离者。今弟所自认悖谬之处,悉以诚心悔改,其他出于无心者,亦断无不可解之理。”[16](32页)由于徐勤等人一再劝说以及梁本人的再

三“认过”,康有为终于“心平气和”地表示“已释疑怒”,尽管他致函徐勤时仍然对梁启超“攻之不遗余力”^④[17](223页)。

最终促使梁启超下定决心、作出最后选择的是章太炎事涉吴稚晖的一封信。1903年夏,“苏报案”发生,章太炎在狱中寄出一信,指责革命派人士吴稚晖向清政府告密,致有此案。梁启超在读到章太炎的信函抄件后,深信不疑。按照他在《新民说》中的理论,从事于社会改造的人,必须具有高尚的人格、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然而革命派中居然有吴稚晖这类卖友求荣的人,这不能不使他感到震惊。此事后经学者论证并非属实,但梁启超由于与上海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保持着密切关系,信以为真,其对革命派的认识顿变。1903年8月19日,梁启超在给蒋智由的信中写道:“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事,弟初睹甚骇,然不怡于中者累日,然犹冀其中之或有他种曲折,欲为吴解免也。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呜呼!不敢复相天下士矣。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东中情形若何?闻留学生会馆散尽,仅余七十人,然否?公行止近复若何?颇思得拯救之法否?沪上被逮六君,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焚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命义矣。”[18](327—328页)

由于吴稚晖“告密”事件导致梁启超对革命党人格的不信任,由于康有为等人的表态所搭好的退步台阶,加上在美洲考察印象不佳(其中或包括梁启超对美国政治文本的误读以及不合政治实际的过高期望),这使得本来就怀疑联合革命党人能否实现自由民权的梁启超最终决定放弃革命。1903年底,回到日本后,他函告蒋智由,“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19](335页)。与此同时,他在《新民丛报》载文公开宣告自己与革命派分道扬镳。这样,流亡海外后一度倾向革命、政治思想趋于激进的梁启超又重新回归到改良主义的政治营垒。

注释:

① 本节有关论述参阅了宋德华著《〈新大陆游记〉与梁启超的美国观》,载《暨南学报》1995年第3期。

② 参阅张衍前《论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理论学刊》(济南)1996年第2期。

③ 详见杨天宏著《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82页。

④ 1903年4月18日,梁启超函告徐勤:“长者续来信,心平气和,甚可喜。”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83 年版,第 321 页。

参考文献:

- [1] 三十自述[A]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2] 夏威夷游记[A] . 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二[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3]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A]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三[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4] (美) 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 . 崔志海, 葛夫平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5] 新大陆游记节录[A] . 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二[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6] 卢梭学案[A]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7] 新民说叙论[A] . 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四[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8] 变法通议[A]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9] 中国积弱溯源论[A]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五[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0]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A]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1] 清代学术概论[A] . 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十四[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2] 康有为与保皇会[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13] 陈少白. 兴中会革命史要[A] . 辛亥革命: 第 1 册[M] .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Z]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14] 郭世佑. 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J] . 浙江学刊, 2002, (2).
- [15] 复黄宗仰(1903 年 12 月)[A] . 孙中山全集: 第 1 卷[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6] 与雪庵书(光绪二十九年)[A] .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17] 徐勤致康有为书(1903 年 4 月 7 日)[A] . 康有为与保皇会[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18]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19] 致蒋观云先生书(1904 年 2 月 3 日)[A] .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Causes Analysis of Liang Qichao's Political Ideological Change Around 1903

DENG Jie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year of 1903 sees a political ideological change in Liang Qichao from the revolution position of repelling Man and implementing democracy and republicanism to that of bourgeois evolution. The causes of the change lie in his disappointment in democratic politics resulting from his investigation of the U.S., his change of political theory, his fear of difficulty due to his realization of the difficulty in improving the national qualities, and his awkward personal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 of his relation with Kang Youwei and Sun Wen.

Keywords: Liang Qichao; American tour; ideological change

[责任编辑: 凌兴珍]